

# 转基因食品语篇的批评性话语分析\*

◎ 林金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学院  
◎ 欧阳护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学院

**摘 要** 近年来，转基因食品话题一直备受争议。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话语现象，本文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解构反转基因语篇和挺转基因语篇的话语建构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反转语篇在建构过程中以诉诸情感和诉诸道德为主要建构策略，而挺转语篇建构策略则显示出一定的排他性；社会转型期间，民众与权威、反转群体与挺转群体之间的复杂话语权关系受到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多方面考察转基因食品语篇背后的权力关系及其意识形态意义，以提高公众的独立批判性思维，营造更加理性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 批评性话语分析；转基因语篇；话语权

## 1. 引言

新媒体的发展使信息传播更加快速广泛，爆炸式的信息涌入人们的视野，不仅给大众带来了便利，同时也造成一定的信息分辨困扰。2017年6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网络环境的净化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那些社会争议性较大的

---

\* 通讯作者：欧阳护华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510420）白云区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学院

电子邮件：en\_ouyang@hotmail.com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转基因谣言的批评性话语分析”（项目编号：17GWCXXM-31）和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的扩散视角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评估体系构建”（项目编号：2017GXJK044）

问题,网络舆情的正面引导也必不可少。当前,转基因食品争议持续发酵,挺转和反转意见不一,积极的舆情引导迫在眉睫。相关争议不仅影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而且制约着转基因作物在国内的推广种植。因此,转基因研究不仅要注重其技术安全性和风险性,也应重视与其相关的话语实践活动。挺转语篇及反转语篇之间的博弈本身也是一种微社会现象,融合了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为分析当下社会,尤其是网络环境中的某些争议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国内大众批判思维能力,消除网络不良信息对公众价值观造成的负面影响,维护正常社会秩序。

## 2. 理论来源、研究语料和研究方法

现有的转基因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主要集中在转基因食品风险感知(Amin, Mahadi, Samian & Ibrahim, 2013; Lu, Xie & Xiong, 2015; Lv & Chen, 2016)、消费者态度调查(张明杨、章棋, 2016)、典型转基因争议事件(刘金荣, 2013)等方面。转基因食品风险感知和消费者态度调查研究对国家推行转基因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如 Lu、Xie 和 Xiong 等人研究了共享价值观如何影响中国城市地区民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他们发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越高,则转基因风险感知程度越低。而典型的转基因个案研究使大众更全面理解某转基因争议事件,从而能客观地判断该事件,如张新苗(2016)针对“转基因大豆致癌”这一具体案例解析该言论的网络传播机制,提高大众对这一谣言的认识,自觉抵制该谣言。在研究视角上,转基因食品研究涵盖各领域,包括食品科学(张忠明, 2015)、新闻传播学(康亚杰、彭光芒, 2016; 唐铮、符策旭, 2017)、法学(刘旭霞、李洁瑜、朱鹏, 2010)、社会学和心理学(李铁, 2011; 贾鹤鹏、范敬群, 2016)等。研究方法上也比较多样,有问卷调查法(庞道华、解瑞宁、隋云南, 2017)、实验法(杨帆, 2017)、个案研究法(杨柳, 2015)等。尽管转基因食品的研究涉及内容广泛,视角具体,方法多样,但并未有相关文献涉及转基因争议话语现状背后的权力关系及其意识形态意义,故引入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视角十分必要。

批评性话语分析基于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 CL)发展而来。它认为语言和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连接媒介,往往不同的媒介观对应不同的研究方法,如 Fairclough (1989, 1992)认为语言和社会之间通过话语实践连接因此发展出话语三维概念模型, van Dijk (2001)认定社会认知这一媒介因此发展出社会认知模型, Wodak (2001)注重历史语境因素因而更偏爱话语历史研究路径等。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社会的不平等性以及权力滥用如何通过语言实现,以期理解、揭露并最终消除这种社会不平等现象(van Dijk,

2001: 352)。大多数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聚焦于单方面解构精英话语,如曾亚平(2009)从人称代词、情态和语篇三个方面解析了奥巴马总统选举获胜演讲;或者解构草根话语,如Liu和Ouyang(2016)研究了药家鑫杀人案引发的网络草根话语的修辞策略与重新语境化过程等。这类研究只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某一社会现象的片面阐释,而无法兼顾精英与草根双方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建构方式,以便我们更客观地理解该社会现象。鉴于此,本文以转基因语篇(包括反转语篇和挺转语篇)为研究对象,探究其话语建构策略及其语用功能,讨论其社会、历史、文化意义,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转基因争议现状。

本文的语料内容包括两部分:反转基因语篇与挺转基因语篇。反转基因语篇语料主要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内容涉及转基因食品影响生育、转基因食品危害健康、转基因食品危害国家安全等多个方面。以相关语篇出现频率较高、转载次数较多、反转代表性较强和社会影响力较大为标准,最后筛选出30篇较典型的反转基因语篇并对其按照不同建构策略进行分类。挺转语篇则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基因农业网”“科通社”等微信公众号。本文运用定性描述的分析方法进行考察,以Fairclough(1995)三维概念模式为框架,融合van Leeuwen(2008)话语策略合法化理论及Martin和White(2005)的态度系统等模式,借鉴Foucault(1979)的权力观以及Althusser(1968)的意识形态理论,对转基因争议事件进行深入阐释,以期揭露社会权力滥用及不平等现象。文章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反转基因语篇中运用了什么建构策略以促其又快又广地传播?(2)针对反转基因话语现象,挺转群体使用了哪些话语策略来应对?效果如何?最后,本文尝试讨论该语言现象背后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因素。

### 3. 被误解的反转基因话语

#### 3.1 反转语篇是话语权的另类实现

新媒体的发展为草根阶层搭建了更多发声平台,而媒体的匿名性、传播快而广等特点为草根阶层提供了发声的便利性和安全性,草根阶层的活跃度提升,对话语权的需求也随之增大。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为反转语篇产生提供了现实条件。不论是权威机构、专业技术和法律保障等方面的支持,还是社会地位和财政资源方面的优势,在转基因争论中反转群体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该群体借助为草根发声的反转语篇载体,顺应群体心理特征,占据情感和道德制高点,截长补短,便能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反转语篇主要通过情感虏获和道德评价策略达到其目的。

我们通过对30篇反转语篇进行态度资源标记(分布状况见图1),发现反转语篇主

要运用了情感资源（占 50%）和判断资源（占 46%），“情感资源的出现直接表明作者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李鸿春，2014：20）。反转语篇利用情感评价转基因食品，以期与读者建立共同情感，一旦“这种情感连接建立以后，听众就有可能对说话人的位置所蕴含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持开放的态度”（胡壮麟等，2006）。鉴赏资源是基于伦理的范畴来评价人或其行为的资源，其判断依据主要来自社会伦理道德标准，以此误导听众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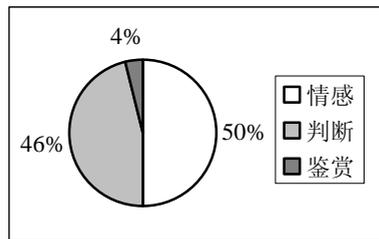


图 1 反转基因语篇中态度资源分布状况

道德评价策略对草根阶层产生影响主要应归因于文化和历史原因。

从文化层面看，中国传统价值观为反转语篇构建和传播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大众，其文化适应过渡尚未真正完成，大部分传统思想仍然根深蒂固。例如“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等被利用来威胁、恐吓人们转基因食品会致癌绝育，以此收获一大批反转信众。如：

[1]老的可以吃（甜玉米），年轻的，没成家的，没生孩子的，一律不要吃（甜玉米）！

[2].....这不是危言耸听，孩子越小抵毒能力越差的道理你应该懂得。“无后为大”，每一个爷爷和奶奶应该郑重其事，每一个爸爸和妈妈应该郑重其事.....

以上两例主要是抽象出传统孝道的价值观。该反转语篇反复强调食用转基因食品会影响人的生育能力，导致家族香火无人继承，是大不孝。孟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观现今仍然禁锢着一些人的头脑（李耀宗、刘翰德、曹积仁，1981：25）。鲁迅也曾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剥夺人的主体意识（王劲松，2006）。因此，大众接收到“转基因导致不育”的反转言论时，容易丧失主体批判意识，忽视信息的真伪。反转者正是迎合这一传统道德观念，塑造转基因食品的反传统

价值观形象,即“转基因食品导致无后,是大不孝”,以此引发大众的恐慌情绪,从而更加排斥转基因食品。这一类建构策略主要通过抽象出该话语实践中隐含的某些价值倾向来合法化其反转行为(van Leeuwen, 2008: 111)。反转语篇中除了利用孝的传统价值观,也还有健康价值观和爱国价值观等。

追溯历史原因,在中国历史特殊时期,一些“极端的、偏激的,甚至暴力性的语言被利用来表达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不信任和仇视”(陈尧, 2011: 24),造成群体的愤怒与狂欢。

[3]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转基因时代,有多少权贵向孟山都转基因生物集团的美元折腰,又有多少汉奸走狗为了捞取血腥的米国狗粮充当可耻的转基因推销小丑。

[4]为了利益而宣传鼓吹转基因固然有问题,但拿钱办事这个逻辑还好理解,套用鲁迅的话,叫做走狗;而那些连钱也没拿到的还在鼓吹转基因的,则是“丧家的走狗”了。

以上例子中通过“汉奸”“走狗”“丧家的走狗”“小丑”等“贴标签”形式,“使用否定的、消极的标签来称呼对方以突出对立群体的异己性”(Ishtla, 1999: 87)。“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旦被贴上负面标签,则将时刻背负这一罪名,导致不好的遭遇。反转语篇作者同样给挺转派频繁贴上消极的标签,由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民众不敢挺转,以免被贴上道德标签。反转语篇统计中,这类消极词汇使用比重较大(占63%),其实质就是通过否定挺转人士来肯定自己的反转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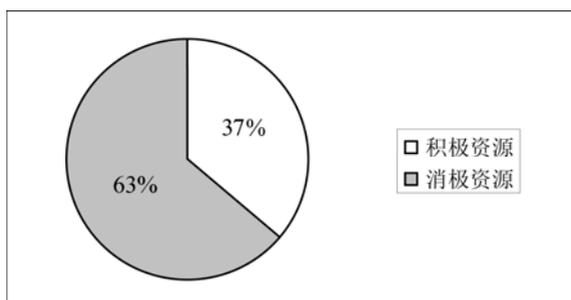


图2 反转基因语篇中积极资源与消极资源利用情况

如图2所示,反转语篇主要通过表达负面情感影响受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情感倾向。Aristotle (1991) 将劝说诉诸分为三种,即理性诉诸(人的理性思考)、情感诉诸(激起受众情感)和人品诉诸(涉及个人品格),其中情感诉诸的目的是在听众中唤起演讲者意

欲诱导的情绪反应，听众或读者可以被激起同情、仇恨、欲望等情感（何晓勤，2004：7）。在反转语篇中，情感资源比重最大（占50%，见图1），且多为负面和悲伤的情感，其中诉诸愤怒和仇恨的情感较为显著。例如：

[5] 农业部：你们不要把全中国人都当成“小白鼠”了！赶快全面禁止种植这种甜玉米了！

[6] 中国人民很生气，农业部官员不吃转基因：不管农业部如何解释，我们都要问一句：美国人都不敢吃，你们是亲美派，是明白的，但为何敢叫中国人吃？你们这不是谋财害命吗？谁给你们的胆子？你们真把全国人民当作小白鼠了？若是想贪财，你们权力很多，为何还要贪这种钱呢？你们是不是发疯了？这真是利令智昏！

反转语料中感叹句和问句运用频繁（语料中达300多句，占比约22%），这类句子大多表示对挺转人士的愤怒和不满以及对权威的质疑。例[5]中农业部代表政府，对转基因的批准有一定的决定权，而普通老百姓只能被动接受。例[6]中一连串的问号表达出对农业部的愤怒、不解和反抗来激起大众的民粹思想。“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被统治者反对统治者的基本政治反应，这种政治反应充满着批判精神与反抗意识。”（林红，2007：71）利用这种批判和反抗意识，反转语篇作者凭借“你们”“我们”等人称代词将自己定位为普通民众一分子，主动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迎合读者立场，与民众一起同仇敌忾，质疑农业部的动机。同时，“小白鼠”隐喻更是将普通大众的遭遇形象化，悲伤和无奈的情感渲染得恰到好处。而当某一言论能使大多数人产生共鸣并且能刺激网民心中“绷得最紧的那根弦”时，他们就会发自内心地转发、声援或声讨（李彪，2011）。

### 3.2 诉诸权威策略体现公众信任度倾向

在论证转基因食品的危险性时，反转者通过遵守精英群体话语规范取得大众信任。与精英话语中权威策略略有不同，反转语篇中的权威内容可验证性较弱，可靠度较小，主要包括专家、明星、少数机构的言论，统计数据和相关实验结果等（van Leeuwen, 2008：108）。如：

[7] 美国国家科学院论证了转基因食品有害健康。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称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不安全。

[8] 从今天起，不管几比几，不要转基因，支持新时代的健康油。（明星乙某广

告代言词)

[9]法国研究证实转基因致癌:法新社9月19日报道,一项研究发现,喂食转基因食物的实验鼠会患上癌症……据研究者统计,做实验的这批小白鼠普遍患上乳腺癌,并出现肝脏衰竭。50%的雄鼠和70%的雌鼠提前死亡……

例[7]主要运用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言论,论证转基因食品不安全,其中“美国国家科学院”“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等,“仅仅借助权威的一个命题或一句话(真假不确定甚至可能为假)来证明一个论题是真还是假”(龙小平、陈爱国,2003:28),以此影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同时,作为意见领袖群体之一,明星的言论往往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出于对意见领袖的崇拜和从众心理,尤其在突发社会事件面前,粉丝们对意见领袖的观点容易接受与附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刘果,2014:117)。如例[8]发挥名人效应,利用广告代言词构建反转口号,不断地对读者进行心理暗示:大众喜欢的明星都公开声明抵制转基因了,那么转基因的确是危害健康的。除了权威言论的影响力,统计数据以及科学实验结果亦可增加反转言论的可信度。例[9]中法国媒体报道“新研究发现”则通过遵守科学话语的建构模式,运用权威渠道惯用的话语策略反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尽管这类数据来源未必可靠,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未必科学,但是能够取得普通民众的信任,说明大众对于权威存在依赖。

### 3.3 信息差策略反映公众对知情权的渴望

[10]农业部幼儿园禁止转基因食品!(农业部明明知道转基因食品有害,自己的后代不吃,却大量进口让全国人民去吃!)

[11]你们不知道,因为中国的媒体从不报道!你们同样不知道,奥运会、世博会、G20峰会等所有在中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一律禁止转基因,你们还不知道,农业部等部委的特供中绝不含转基因。

例[10]通过制造信息差引出知情与否的差别待遇。例[11]层层深入,以揭露不为人知的消息为出发点,唤起民众的知情权意识。假借转基因知情权制造官民对立,这正好契合了网民的现实社会情绪(王创业、张蕊,2015)。该对立中普通民众成为信息差的受害者,极易激发民众内心的不平等情绪,取得大众信任,最终实现由于转基因安全性不公开问题引发的“社会不公”的集体批判(杨柳,2015:81)。这一类建构策略反映出受众对于知情权的渴望,由于缺乏转基因的权威信息,各类猜忌和疑惑被反转语篇建构者利用以混淆公众的判断。

反转现象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大众文化，民众不能够默契、妥协和认同挺转文化并有意识地避开、抵抗精英意识形态进而重构自己的意识形态（参见 Fiske, 1989）。反思这一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可知反转语篇在公共话语空间内与大众协商取得一致，其生命力才得以延续。反转语篇建构策略虽具有情绪化、道德化和非理性化的特征，但其“在一定意义上扮演了民意信息反馈的作用”（李大勇，2014：100），反映出大众对于话语权、知情权的社会心理诉求，因此正确理解反转语篇有助于引导转基因争议舆情走上正确的道路。

#### 4. 挺转语篇霸权文化

挺转语篇中话语建构具有精英话语的语言特征。精英话语体系历来以诉诸逻辑为主，其在话语策略上则主要利用权威机构发布的言论、科研论文、真实数据等（如策略 1）。但与此同时，由于专业知识垄断赋予各领域精英话语的霸权地位，使圈内人与圈外人分隔明显，其话语再现易形成“资格说”等现象（如策略 2）。“语言选择可以建构出讲话人的性格、身份及社会关系”（田海龙，2009：200），精英资格说以身份排他策略暗示出反转群体与挺转群体的“权力差”，其政治立场与人民大众和民主思想相悖，无形中将自己定位在大众的对立面。然而，少数挺转成员亦认识到由精英文化霸权造成的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主动改变挺转话语策略（如策略 3），顺应大众心理，利用情感诉求取得大众的信任并进行平等对话。这其中，诉诸权威和情感策略在反转语篇中也有涉及，但挺转语篇中其诉诸的内容有所不同，因此其语用效果亦不一样。

##### 策略 1：利用权威机构和实验数据

在挺转语篇建构中，诉诸权威策略的内容可靠性更强，可验证程度更高，其包括准确的科研数据、翔实的转基因科研报告、众多的政府和科研机构担保转基因安全性等。具体如下：

[12] 《转基因作物：经验与展望》报告长达 388 页，由 50 多位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耗时两年撰写而成。报告详尽分析了过去 20 年中约 900 项关于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报告，召开了 3 场公开听证会和 15 场网络研讨会，听取了 700 余条公众意见……

例[12]通过诉诸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阐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50 多位科学家”

表明该报告的可靠性,“20年”表明研究时间跨度较大,分析内容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涵盖面较广,包含研究报告、听证会、网络研讨会、公众意见等。

[13] 世界卫生组织 (WHO) (联合国系统内的卫生指导与协调单位) ..... 欧盟委员会 (EC) (欧盟的执行机构) 历时逾 25 年、500 多个独立科研团体参与的 130 多个科研项目工作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生物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与传统作物育种技术安全性相当。美国科学与健康委员会.....

[14] 通过对美国《科学引文索引》全部科学论文 (SCI) 的检索与阅读,得出绝大多数研究成果 (9000 多篇,占比 90%) 表明转基因技术是安全的和可控的;几乎所有得出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结论的论文 (占比 10%), 均被证明是错误的.....

例[13]诉诸“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委员会”“美国科学与健康委员会”等 20 多家权威机构论证转基因安全性。而例[14]通过对比科研成果数据,证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定论。科研论文来源权威,且告知受众 10% 的证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论文存在研究过程不科学、过程不规范,排除其结果的可靠度,消除受众的担忧。

## 策略 2: 利用身份排他性

话语本身就是权力形式,某一话语产生的结果就是权力产生的结果(吴猛、和新风, 2003)。挺转话语反映出挺转精英的权力形式,体现在话语策略上则出现利用身份地位排除他人的做法。

[15]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吃 (转基因食品), 但是不要造谣阻碍中国农业技术发展。我科普的是各国际权威科学机构认可的科学, 你根本不懂, 有何资格质疑? ..... 质疑科学问题, 就需要资格, 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学位, 但至少得让专业人士相信你懂行.....

[16] ..... 说句老实话,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黄金大米的科学问题呢?

自 2013 年方崔微博激战以来, 转基因话题一度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两人不顾场合的唇枪舌剑, 使公众更加质疑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例[15]摘自生物化学博士兼科普作家 F 的言论。例子中反问句“你根本不懂, 有何资格质疑?” 暗含“我懂, 我有资格科普而你不懂, 你没资格质疑”之意。F 强调质疑科学问题要有懂行的资格, 企图通过其身份、地位优势压倒反转方, 很容易激起大众的逆反心理。Silver (1994) 认为因垄断产生的共同体会对外部者不公平, 并且往往被排斥者既是外部人, 也是大多数人。F

的回应不仅脱离“转基因是否安全”这一争论本身，也将自己置于大多数的对立面。同样，例[16]中来自另一位教授L的争论回应也相应地暴露出精英话语的霸权现状。这位教授虽然是一名知识精英，可是他的话语选择构建出自己是处于优势地位的知识阶级。但是“真的知识阶级”不听命于任何权威，发表的是倾向于民众的思想（胡梅仙，2013）。然而，该教授在发表言论时并未考虑到这一点，他的“资格”说法无意中将自己放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科学的话语权不应被专家垄断，公众都有权发表意见”（江晓原、方益昉，2016），公众的言论本就无法做到专业、内行，所以更需要专业精英加以正确引导，而精英话语体系未能充分考虑大众的接受度，因此阻碍了反转群体与挺转群体顺利互动。

### 策略3：诉诸情感

新媒体发展使民众话语权提升，精英话语权削弱，两者话语权的博弈亦揭示出精英话语权消解与重构的过程（张炳杰，2016）。反转先入为主占得大众市场，挺转群体则可通过重构自己的话语体系，顺应大众心理，扭转当前不利形势，重新赢得大众的认同和信任。如下例：

[17].....而人类寿命的延长你就不提！没有病理学上的任何联系嘛！况且发病率增加在前，转基因推广在后嘛，你这不是威胁、恫吓民众吗？.....你可以不懂转基因，但对国家严格的转基因安全评价体系及政策，可有过一次回应？可向你的粉丝解释过一次？.....专家群体无奈着、‘傻逼’着、忍受着！窝囊吗？委屈吗？.....谁落后，谁就无缘新一轮生物经济蛋糕的分割！.....

例[17]是某广东海洋大学农学院教授Y通过《别了，转基因——致反转先锋们》一文向大众解释转基因。全信一共67句话，其中感叹句、问句和反问句占42句，比重之大可知此语篇中情感策略占主导地位。摘录中“你这不是威胁、恫吓民众吗？”“专家群体无奈着、‘傻逼’着、忍受着！窝囊吗？委屈吗？”等构建作者局外人的视角，以使自己的言论显得更为客观公正。例子中塑造的“你（反转人士）”“民众”“专家”的形象暗示出他们三方的关系：无辜的百姓、无奈的专家群体都成为别有用心者的牺牲品。与反转语篇中诉诸愤怒和仇恨的感情有所不同，此处挺转语篇通过示弱、诉诸同情，展示出挺转群体进退两难的境遇，能引起更多人共鸣，同时也诉诸恐惧，将百姓被反转者愚弄的真相展现给大家。在这封信中，属于精英阶层的Y放弃一贯的逻辑诉求，而以情感诉求为主，由此精心策划其语言选择以获得大众认同，起到良好的共情效果（参见

Liu & Ouyang, 2016)。

新媒体时代下, 民众话语权意识增强, 挺转科普话语策略也应做出相应改变以适应大众心理。一味秉持旧有的话语体系不仅使转基因科普收效甚微, 而且易与公众之间形成鸿沟。反观反转基因语篇, 其话语策略应和民心, 所以更容易获得大众的支持。

## 5. 结语

作为当下社会争议事件的话语分析,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一方面, 该争议事件研究对社会网络舆情引导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同时有助于政府更好地理解社会反转现象, 从中发现真实的民意, 采取正确的舆论引导方式, 制定恰当的法律法规, 以推动我国网络安全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融合历史语境因素解构转基因食品语篇, 为理解转基因争议事件提供新视角, 为转基因科普话语建构提供更多的话语路径选择。

### 参考文献:

- Althusser, L. 1968.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Mapping Ideology*, (4): 300-304.
- Amin, L., Z. Mahadi, A. L. Samian, et al. 2013. Risk perception towards food safety issues: GM foods versus non-GM foods. *Journal of Food Agriculture & Environment*, (1): 28-35.
- Aristotle. 1991. *The Art of Rhetoric*. London: Penguin Books.
-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New York: Longman Publishing.
- Fiske, J. 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New York: Random House.
- Ishtla, S. 1999.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Thomas, L. & Wareing, S. (eds.). *Language, Society and Power: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 Liu, Q. & H. H. Ouyang. 2016. The recontextua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symbolic capital in Chinese online grassroots discourse. *Discourse & Society*, (5): 500-515.
- Lu, X., X. Xie & J. Xiong. 2015. Social trust and risk percep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in urban areas of China: The role of salient value similarity.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

199-214.

- Ly, L. & H. D. Chen. 2016. Chinese Public's Risk Percept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From the 1990s to 2015.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 (1):110-128.
- Martin, J. R. & White, P. P. R.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Silver, H. 1994.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5): 531-578.
- van Dijk, T. A. 2001. Multidisciplinary CDA: A plea for diversity.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van Leeuwen, T. 2008. *Discourse and Practice: New Tool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dak, R. 2001.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In R. Wodak & M. Meye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陈尧, 2011, 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 从虚拟集聚到社会运动, 《学术月刊》, 第 6 期, 24-29 页。
- 何晓勤, 2004, 演讲·劝说·诉诸·语篇, 《外语与外语教学》, 第 11 期, 7-9 页。
- 胡梅仙, 2013, “特殊智识阶级”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思考,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2 期, 169-181 页。
-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 2006,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贾鹤鹏、范敬群, 2016, 知识与价值的博弈——公众质疑转基因的社会学与心理学因素分析,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2 期, 7-13 页。
- 江晓原、方益昉, 2016, 《科学中的政治》,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康亚杰、彭光芒, 2016, 转基因话题微博谣言传播的“回声室效应”, 《新闻世界》, 第 4 期, 48-53 页。
- 李彪, 2011, 《谁在网络中呼风唤雨》,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 李大勇, 2014, 谣言、言论自由与法律规制, 《法学》, 第 4 期, 100-106 页。
- 李鸿春, 2014, 《社会科学类综述语篇评价意义分析》,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铁, 2011, 剖析中国式的转基因谬误与谣言, 《湖南农业科学》, 第 16 期, 9-12 页。
- 李耀宗、刘翰德、曹积仁, 1981, 略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道观, 《人口研究》, 第 4 期, 25-29 页。
- 林红, 2007, 《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刘果, 2014, 微博意见领袖的角色分析与引导策略,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2 期, 115-118。

刘金荣, 2013, 基于 SNA 的突发事件微博谣言传播研究, 《情报杂志》, 第 7 期, 78-82 页。

刘旭霞、李洁瑜、朱鹏, 2010, 美欧日转基因食品监管法律制度分析及启示,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 期, 23-28 页。

柳青, 2016, 《草根话语的力量从何而来?——传统“民粹”话语在网络空间的重新语境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龙小平、陈爱国, 2003, “引证权威”与“诉诸权威”谬误辨析,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第 1 期, 27-29 页。

庞道华、解瑞宁、隋云南, 2017, 大学生转基因食品知识态度行为调查, 《职业与健康》, 第 5 期, 676-678 页。

唐铮、符策旭, 2017, 新媒体的信息点评估及舆论波动规律——以微博转基因视频的舆论流变为例, 《当代传播》, 第 5 期, 104-106 页。

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创业、张蕊, 2015, 被框架的网络事件: 用对立制造认同——以 2014 年网络热点事件为例, 《宜宾学院学报》, 第 4 期, 74-79 页。

王劲松, 2006, “知识分子原罪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认同——论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民粹思想的双重文化心理, 《江淮论坛》, 第 4 期, 152-157 页。

吴猛、和新风, 2003, 《文化权力的终结: 与福柯对话》,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杨帆、余升翔、陈璟等, 2017, 基于不公平感的谣言对转基因风险评价的影响, 《心理科学》, 第 4 期, 941-946 页。

杨柳, 2015, 天涯论坛网络公共话语表达的分析——以“方崔”转基因论战为例, 《东南传播》, 第 6 期, 79-82 页。

曾亚平, 2009, 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角度解读奥巴马的总统选举获胜演讲, 《外语与外语教学》, 第 2 期, 19-21 页。

张炳杰, 2016, 新媒体场域精英话语权的消解与重构, 《当代传播》, 第 5 期, 92-94 页。

张明杨、章棋, 2016, 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态度研究的调查方法荟萃分析——基于 SCI、SSCI、CSSCI 等索引的统计, 《统计与信息论坛》, 第 6 期, 98-105 页。

张新苗, 2016, 微博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以新浪微博“转基因大豆致癌”谣言事件为例, 《新媒体与社会》, 第 1 期, 158-172 页。

张忠明, 2015, 转基因食品标识阈值问题研究, 《食品科学》, 第 9 期, 254-259 页。

##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Discourse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Lin Jinro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Ouyang Huhu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GM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topic in China. To better understand this linguistic phenomenon, this paper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ructing mechanism of grassroots discourse of anti-GM food and elite discourse of pro-GM foo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emotional appeal and ethical appeal are two major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volved in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anti-GM food, while strategies in the discourse of pro-GM food indicates hegemonic ideology.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the discursiv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authority, the anti-GM group and the pro-GM group are influenced by many historical as well as realistic factors. Based on the multi-analysis of th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ideologies hidden in discourse of anti-GM foo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mprove the public'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so as to build a more rational society.

**Key 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 Discourse of GM food, Discursive rights

### 作者简介:

林金容, 博士。研究方向: 话语分析。

欧阳护华, 博士, 教授, 博导。研究方向: 话语分析、英语教育。